世界经济

中美合作对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 陈建奇

中美不仅是全球系统重要的经济体，而且经济总量位处世界前两位，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深，中美经济与外部联系日益增强，中美经济波动不仅影响自身宏观经济稳定，而且对其他经济体也将构成较大的溢出效应，对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将构成较大影响。美国凭借较强的科技、军事及美元霸权等综合实力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通过承接全球产业分工形成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及其位居世界第二的体量对全球经济发展也将形成内在影响。尽管全球经济自2010年以来保持复苏增长态势，但危机以来表现强劲的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出现减速分化，而发达经济体呈现复苏分化，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访美，这不仅对于深化包括经济在内的中美合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经济主导全球经济走势

尽管中美各自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并非稳定不变，但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却稳定在三分之一左右，这显示了中美在总量意义上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1980年至20世纪末，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用汇率标价尽管经历波动但均持续保持在25%以上，而用购买力平价（PPP平价）测算的比重也在20%以上。同期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用汇率标价最高为1999年的3.4%，PPP标价的比重最高出现在1999年的7.1%。然而，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占比出现小幅下降态势，汇率标价的占比从2001年32.2%的高点下降到2014年22.5%，PPP标价的占比则由2001年的20.7%下降到2014年的16.1%。同期中国在全球的占比出现了较快提升，汇率标价的占比由2000年的3.6%上升到2014年的13.4%，而PPP标价的占比则由2000年的7.4%上升到2014年的16.3%。

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的相对提升与美国经济占比的小幅下降构成了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虽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未被撼动，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则持续增强。1980—1999年共20年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仅为3.8%，同期美国贡献32.2%。但2000—2007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大幅上升至9.5%，同期美国下降为17.3%，如果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进一步测算可以发现，2008—2014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高达40.8%，而美国为18.9%。由此来看，中国对全球影响虽然在总量上弱于美国，但在增量上却呈现增强的态势，预示中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

然而，单纯考虑经济体量还不能较好说明中美对全球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封闭经济体对外部的影响较小甚至可能是微弱的。从实际来看，中美贸易大国的地位预示中美与外部的深度联系，由此决定了其对全球的较大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2.5%上升到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62.3%，体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外部经济合作持续深化的现象，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增长的特征。美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0%的低点上升到2007年28%的高点，体现了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外部合作的重要特征。尽管金融危机都对中美的对外贸易构成影响，但截至2014年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仍然分别高达41.5%与30.1%，体现了中美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共同特征，中美经济与外部联系的持续加深促使中美对其他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持续增强。

中美经济不仅构成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且主导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新世纪以来，中国通过释放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全球产业分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拉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经济的景气增长。与此对应的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并借助金融比较优势持续推动金融创新，大量吸引中国等拥有较高储蓄的新兴经济体资金流入，支撑着美国依赖金融产品透支消费模式的持续进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预示美国过度金融创新难以持续，由此形成外部融资的抑制，反过来制约美国等发达国家外部赤字的增大，倒逼外部经济的再平衡，全球贸易需求出现萎缩，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大宗商品输出国面临着经济低迷的重大挑战。上述迹象体现了危机之前的全球失衡模式亟待改变，而全球经济再平衡倒逼中美经济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增长有赖于构建有利于中美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的新型大国经济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助推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中美在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决定中美未来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分配可能面临着竞争或者冲突。但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美经济分处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决定了中美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美两国的占优策略是寻求更加务实理性的合作关系。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之间虽然也存在贸易争端、汇率争议等问题，在TPP、“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合作也显得不足，但这些不能也不应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常态。中美应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及合作领域，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夯实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助推中美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核心平台。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颇具复杂性、长期性，必须依靠重要的双边机制进行常态化的谈判与沟通，才能更好实现全局性的突破。近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中美双边重大事务讨论的常态化平台，中美双方已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举行了七次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尤其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币加入SDR等重要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以考虑将其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核心平台。

将中美自贸区谈判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抓手。美国在金融危机以来提出构建TPP的重大倡议，中国并没有包括在首轮谈判之中，外界担心中国会被边缘化，但主流的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相比加入WTO之前已经差异巨大，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已经跃居全球首位，不包括中国的TPP是不完整的。然而，中国当前倡导构建的“一带一路”等区域一体化战略中，美国也还没有提出申请，这也是不完整的。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应考虑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将无法落到实处。可以考虑将构建中美自贸区作为抓手，如果中美能够构建自贸区，那么中美两国的合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将深化经贸合作助推结构改革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但双方的合作空间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当前进入了海外投资的高峰期，亟待在全球寻求投资合作，美国经济发展也亟待外部投资者进入，美国可以逐步放宽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在贸易方面，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中美可以进一步探讨通过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等举措来拓展双方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美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正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中美应秉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原则，积极开展产业创新投资合作，延伸各自产业链。特别是两国可以探讨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等新兴领域的战略合作，破解前沿科技创新难题，以此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将创新国际经济秩序作为增强中美对全球经济稳定作用的重要制度保障。中美须顺应当代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现实，着力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创新变革，既减少中美双方在当代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冲突，也为世界各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热点透析

“熬冬”：俄罗斯面临的挑战

□ 姜 毅

俄罗斯与西方因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对抗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各方依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相互较劲既给俄罗斯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使地区局势出现紧张和变动态势。

近两年，世界经济逐步显现出从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的迹象。2013—201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其中主要经济体2014年的状况大都好于2013年。然而，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却恰恰相反。2013—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呈现下降态势。特别是2014年只有0.6%的增速，为最近15年（除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最低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建设规模明显萎缩；进出口贸易双双下降；消费增长趋缓；通货膨胀率创6年来新高。尤其是2014年年中以汇率暴跌为标志，卢布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年内最大跌幅甚至超过100%。

陷入衰退的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经济出现这种“逆势”状况是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出现拐点、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关键是其产业结构、增长动力、财税收入均不断能源化。在谈及2000年后俄罗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人们往往注意到政权治理的效率和成绩，却忽视了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彼时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不断大幅上扬。实际上，是因为石油美元的大量涌入帮助了俄罗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摆脱了萧条，踏上了复兴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个增长过程中，苏联时期就积累下来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进一步加重，到2014年时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在工业中占比已从苏联时期30%多增加到了一半。

其实，俄罗斯政府和许多专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发展模式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内虚”，也都表示要改变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政府制定的不少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提出要向创新型经济转变。普京早在第一任期初始就表示要改变经济形态、调整经济结构，但十多年过去，当初的规划基本停留在纸面，结构调整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导致转型步履蹒跚的根源是发展战略依然以“赶超”为指导思想。急切地期望迅速提升宏观经济指标以证明政权的正确和效率、满足社会的强国心态，就很难集中精力于调整结构、营造创新环境这类“慢工”，也很难容忍依靠能源取得的主要统计指标看起来不美。

与这种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紧密相关的，就是出现了“旧”的、“传统”的东西恢复的迹象：行政介入经济运行、政府较多参与社会活动、垄断排挤竞争、权力取代规则。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加强了，但政府适应市场经济的职能却未见明显改变，政府的服务性未见明显提高。可以说，俄罗斯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成分单一化与能源垄断集团和经济治理方式共同作用，导致投资低效率、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自我修复和创新能力。也是因为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的种种负面效应导致了2013年增速急剧放缓。显然，这样的病体一有风吹草动就极易招致侵袭。2014年外部经济因素“放大”和政治因素“助推”，果然使俄罗斯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从经济背景看，美元汇率走强、需求不足、能源新技术革命等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一路走低，俄罗斯的石油美元收入锐减。在政治上，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逐步升级，从冻结个人资产、禁止入境升级到动用金融手段，再到对能源、军事、金融等俄罗斯最关键领域实行制裁。其中反映最为迅速的是欧美对俄罗斯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制裁，它直接增加了俄罗斯企业融资难度，使其融资成本大大上升，同时也限制了外资注入以及俄罗斯自有资本的国际运作空间。

尽管俄罗斯领导人多次表示，形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到2018年可以走出困境。但稍微分析就会看出，实际形势并不那么乐观，俄罗斯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在所难免：无论是导致衰退的诱因，还是恶化病情的推力，目前都没有看到任何缓解的迹象。而且，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仍然在持续衰退中，今年上半年GDP下滑2%，通胀近16%。由储备基金、福利基金和外汇储备构成的三大国家储备从高峰期的5000多亿美元减少到2015年7月的约3600亿美元。

处于战略焦虑状态的俄罗斯外交

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同时，俄罗斯的外部环境也因乌克兰危机而恶化。乌克兰危机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安全和地区结构安排上的根本矛盾，相互间的对立和不信任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入新的低谷，陷入冷战后最严重的危机。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年多后，卷入冲突的各方政策实际上进入了难以转圜的怪圈：乌克兰断定自身安全遭到威胁，进一步强化向西方靠拢的态度——西方重新把俄罗斯视为重要对手，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做文章——俄罗斯又因此确信新的反俄阵线在步步逼近，更要巩固在乌克兰东部的阵地。尽管各方签署了两份明斯克停火协议，实际上不仅在根本解决问题上没有丝毫进展，连停火本身都难以维持。虽然性质、诉求不同，但各方矛盾焦点都集中在“安全”上。这说明，尽管冷战过去20多年，曾经以为消弭的鸿沟、解决了的老问题依然存在，且不时发酵。

冷战后很多年，俄外交一直处于某种战略焦虑状态。一方面，想以新的身份进入世界，不愿与西方陷入对抗，希望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另一方面，又试图恢复苏联的地缘政治遗产，以及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后，在西方陷入困境、多极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随着国力的恢复，俄罗斯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从乌克兰危机演化过程中可以看出，曾经的战略焦虑变为战略冲动。从国家长远发展和与西方竞争的长周期看，在克里米亚和乌东问题上的“绝地反击”代价不可谓不大，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还可能是长期的。

当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重新聚焦于地缘政治和传统安全问题上，安全困境问题再次成为俄罗斯外交事务的头号议题。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历史上的“恐俄”心理重新抬头，又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支撑西方政治势力“遏俄”“防俄”政策的社会基础。北约集团开始研判是否重新强化集体防御功能、强化军事建设的色彩，美国和北约有了更多理由促使欧洲盟国加大防务开支。2015年年初的北约防长会议决定在东欧国家建立六个防御指挥部，以不断在东欧地区进行演习的方式调整军事部署。1997年北约向俄罗斯做出的不在新盟国部署军队的承诺几乎失效。不断增大的安全压力又迫使俄罗斯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尽管经济低迷、财政紧张，军费开支却继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节奏，影响了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

外部环境恶化使增长乏力的经济雪上加霜，俄罗斯与西方较量的一些弱项和短板已经逐步显现，未来几年，经济发展显然已让位于克服危机。从目前情况看，普京在新一轮任期之初的经济发展目标已不可能实现，强军、民生等一些方面的具体指标至少也无法全部兑现。其实，回过头看，2011年和2012年两次惊心动魄的大选、2013年发展的瓶颈都已经传递出非常明显的信号——加快改革、夯实发展的稳定基础。2014年因“收复失地”和外部压力制造出的民族主义兴奋点只是暂时冲淡了这个信号，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2016年和2018年两场选举到来，存在的问题难免不再被拿到桌面。毕竟，国家不可能在对外“呲牙咧嘴”的同时，集中精力于内部建设，不可能同时打内外两场“进攻战”。

无论乌克兰危机最后以何种方式画上句号，乌克兰都很难再将对俄关系作为优先指向，克里米亚问题必然长期困扰两国关系。俄罗斯促使乌克兰参加欧亚地区一体化的努力已经无法实现。长期作为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乌克兰陷入全面的危机也使俄罗斯丧失了一个巨大的传统市场——事实上，2014年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贸易大幅度下滑与俄乌贸易受挫有直接关系。俄罗斯试图通过支持东部分离运动、倡导联邦制改革，牵制乌克兰未来政策走向的做法也可能导致并不符合其预期的后果：如果乌克兰东部持续混乱、甚至失控，出现俄罗斯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所说的“中东化”状况，将在俄罗斯家门口营造出一个不稳定源，对其安全、经济和社会稳定未尝不是沉重的包袱。

当然，尽管同时面临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两大挑战，俄罗斯也不可能就此“崩盘”。俄罗斯政府对社会的掌控力度、普京持续获得的极高支持率都预示着，无论何种方式的“颜色革命”都将以失败告终；而体量如此巨大且仍保持一定应对资源的经济体，也不可能因外部制裁而被摧毁。“熬”过这场“严冬”应该可以期待，而“熬冬”的成本和时间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自己的努力。

时 评

日本加快“离岛”“国有化”步伐意欲何为

□ 庞中鹏

目前，日本与周边国家都有岛礁争端问题。其中包括：日俄北方四岛问题（即俄方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韩岛礁争端问题，韩国称独岛（朝鲜语：독도，罗马字：Dokdo或Tokdo），日本称竹岛（平假名：たけしま，罗马字：Takeshima），国际上称利扬库尔岩；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冲之鸟礁（日本称之为冲之鸟岛）问题等。

近两年，日本又提出了所谓“西南诸岛防御”问题，“西南诸岛”这四个字频频见诸日本媒体。

继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彦政权非法对中国固有、神圣的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所谓的“国有化”闹剧以来，日本并未按捺住继续对其他远离日本本土的“离岛”进行“国有化”的步伐，从2014年开始，日本又欲开始新一轮大规模的“离岛”“国有化”行动。

2015年6月30日，日本政府召开综合海洋政策总部（总部长为首相安倍晋三）会议，确定了有关“离岛”保全和管理的新基本方针，其中明确写到将在2015年度内确立钓鱼岛附近大型巡逻船组成的“警备专队体制”。该基本方针称，将加快作为日本领海基点的约280个无所有者的无人岛的“国有化”进程，旨在“加强对领海的管理”。

日本的所谓“离岛”，是指除本州岛、北海道岛、四国岛、九州岛及与上述四大岛之间有桥梁或隧道等公共交通设施相连接的岛屿之外的其他岛屿。日本方面认为，可作为日本领海范围依据的400多个离岛，还有大部分未确定是否有私人岛主，在日本海上保安厅所制作的海图中，有200个属于无名岛。日本在掌握这些岛屿的状况后，将会为无名岛取名，并将它们列入日本地图。早在2009年日本民主党执政的时候，日本已做过一次调查，那时，日本周围的400多个岛被作为日本领海和经济海域界线的基点，当时仅仅调查了99个。

而就在日本政局呈现浓重保守右倾氛围的敏感时候，安倍政权在此时这个节点推出大规模“离岛”“国有化”计划，不能不说其有着深层的战略野心。

首先，所谓的“离岛”“国有化”计划是为了扩张日本的海洋权益与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

按照海洋地缘政治的理论，海洋中分布的各个岛屿，就是天然的固定军事据点，谁占据与拥有了海洋中的岛屿，特别是处于海空交通要道的岛屿，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制海权”，谁拥有了“制海权”，谁就拥有了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谁就是海洋大国与强国。

长期以来，日本都以“海洋大国”自居，在日本看来，其周边的海域就是守护日本本土安全的天然战略屏障。不断扩展日本的海洋权益，不断扩张日本的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是日本多年来就有的潜在战略野心。近年来，日本“不遗余力”地费尽心思在“海洋”上做文章，尤其紧盯着散布在太平洋上的众多岛礁，因为日本也深知，日本本土地理狭长，缺乏大陆国家拥有的有效战略纵深，战时本土极易被攻破。要想克服日本本土的致命弱点，就须大力利用日本是“海洋国家”的优点，从海洋上寻找战略纵深，从海洋上寻找战略屏障。而辽阔的太平洋、那些分布在太平洋上的“星星点点”的岛礁，就是日本周边天然的战略纵深与战略屏障。一旦众多的岛礁完全由日本政府“收归国有”，就可以使日本拥有战略缓冲的机动权，就可以掌握“制海权”，为日本在战时赢得战略主动权，提供先机与便利。

其次，是为了日本寻找与占有海底能源与资源做战略准备。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本土严重缺乏石油与天然气等常规化石能源的国家，支撑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油气等能源都须从海外进口，为了逐渐减少对海外能源进口的依赖，近年来日本也在花大力气在日本周边海域探寻海底能源与资源。

2012年6月，日本一研究小组发现，在日本南鸟岛周边的海底可能存在大量稀土，如果可以开采出来，这些稀土可供日本国内使用230年。该研究小组发现在距离南鸟岛约300公里、水深约5600米海底采样的泥土中富含镝等稀土元素，这种泥土堆积范围超过1000平方公里，可能蕴藏着约680万吨稀土。

而在冲之鸟礁周围海域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这些区域还蕴藏着大量铜矿等稀有金属矿、海底热水矿床等资源。另外，近年来，日本在太平洋海底以及日本海海底发现了储量可观的“可燃冰”（新一代能源——天然气水合物）。

2014年7月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综合海洋政策总部的会议上向相关阁僚下达指示，要求为冲之鸟岛（即冲之鸟礁）以北四国海盆等2个海域延伸大陆架出台相关政令。安倍表示：“为延伸大陆架，希望相关省厅切实采取制定政令等措施。”日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延伸大陆架来进一步挖掘稀有金属、天然气等海洋资源。而安倍在会上也强调：“从广阔海洋获取的资源很大程度上可以开创日本的未来。”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能源资源的相继发现，更加促成了日本加快离岛“国有化”的步伐，当日本正式把这些离岛收归“国有”后，这些岛礁周边海底蕴藏的丰富的能源资源就完全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日本可以随时随地开始试验与采掘，如果试采掘顺利，证明可以大规模商业开采的话，日本届时就可以成为一个能源资源大国。